

四十二起 谋杀希特勒的案件

〔德〕维尔·贝特霍尔德 著

龚新康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Will Berthold
Die 42 Attentate
auf Adolf Hitler
Wilhelm Goldmann Verlag
1983.11

四十二起
谋杀希特勒的案件
〔德〕维尔·贝特霍尔德 著
龚新康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5千字 插页8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67·3 定价：1.30元
印数：00001——65000册

译 者 说 明

历史上究竟发生过多少起谋杀希特勒的案件，看来很难调查清楚。迄今为止，人们谈论较多的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和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拉斯滕堡“狼穴”大本营的两起炸弹谋杀案，而大部分其他谋杀案则很少为人所知。本书作者维尔·贝特霍尔德根据幸存的目击者的证词、警察机构的档案和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论著，整理出四十二起谋杀案的始末，对研究纳粹德国的抵抗运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维尔·贝特霍尔德一九二四年生于德国班贝格，曾写过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专著，创作并导演过十余部故事片和电视文献片，是联邦德国的著名作家和导演，其著作有的已被翻译成十四种文字出版。

本书根据联邦德国威廉—戈尔德曼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版译出。

目 录

第一章	最初的尝试·····	(1)
第二章	圣巴托罗缪之夜·····	(20)
第三章	左右两派的刺客·····	(38)
第四章	独裁者的冒险活动·····	(53)
第五章	冲击总理府的 特遣队·····	(62)
第六章	专家和外行·····	(81)
第七章	流产的生日谋杀·····	(102)
第八章	令人遗憾的十三 分钟·····	(108)
第九章	科尔特案件·····	(136)
第十章	雇佣刺客·····	(145)
第十一章	策划在西方 行动 在东方·····	(153)
第十二章	元首座机炸弹谋 杀案·····	(165)
第十三章	在军械库动手·····	(178)
第十四章	反 击·····	(184)
第十五章	女武神计划·····	(192)
第十六章	尾 声·····	(222)
附 录	谋杀希特勒的未遂 案件一览表·····	(227)

第一章

最初的尝试

下午，他经常带着两、三个便衣到宾客熙攘的柏林“凯撒霍夫”饭店去喝茶，总是坐在为他预订的桌边，彬彬有礼地、但多少有些不太自然地向身旁的客人招呼致意，然后边欣赏着匈牙利吉卜赛人乐队的演奏，边品尝着奶油蛋糕。

要不是跑堂格外殷勤地伺候他，客人们也许就不会对他产生特殊的兴趣，也许认为，此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从单调枯燥的工作中偶出小憩的中等政府官员而已。

然而，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阿道夫·希特勒，人称“领袖”，可保罗·冯·兴登堡却叫他“画匠”，不过这倒并未妨碍这位老态龙钟的总统任命他当帝国总理。

人们私下都在议论，新任总理经常来此光顾，并始终坐在同一座位上。久而久之，连周围的餐桌座椅也都成了“文物古董”，甚至只有在黑市才能觅得。在这个“当年的避难者”（希特勒传记作家约阿希姆·费斯特语）的附近，总是

坐着那几位女士，她们举起长柄眼镜，饶有兴趣地、带着几分肃然起敬的心情，端详着这位德意志共和国的第二十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总理。她们虽然都已年过半百，但是依旧狂热地崇拜这个布劳瑙人。其中有慕尼黑钢琴制造商的夫人，她曾教导他，葡萄酒里不可放糖（这个令人神魂颠倒的人直到一九二四年才反对酗酒），橄榄绿的衬衫和大红的领带不配蓝色的外套。

大家的好奇，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负担，但这个“疯狂的煽动家”（彼得·霍夫曼语）表面上却显得那么和颜悦色，举止闲雅。他周围既无隔离顾客的绳索，也无身着制服的警察，顾客的提包和公文包未受检查，甚至无人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领袖到来之前，也无人查问顾客中有否犹太人或共产党人。

他像个普普通通的顾客，谦恭平和，温文尔雅，颇有点儿资产阶级的风度。他不能容忍在其四周出现任何警察，特别是穿制服的。他偏爱高速汽车，拒绝乘坐装甲避弹车。他时常命令司机开快车，把警卫车远远抛在身后。

希特勒依然出入在他偏爱的饭店，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只是不带明显的警卫而已。无论是在慕尼黑的卡尔顿茶室和柏林的温特加登饭店，还是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面临莱茵河的德累森饭店的露天平台上，他都禁止随行非难其他顾客。他不顾生命危险，企图以自己的公开露面来驳斥其政敌对他的贬责和中伤。冲锋队残暴凶狠的夜间行动已经暂时结束。据说，第一批共产党人已被关进监狱；柏林已建立了五十座野蛮的集中营，其中还关着冲锋队的人，他们遭到了毒打，但是有些走运的后来用几箱啤酒就被赎了出来。

从阿尔卑斯山脉到波罗的海，无处不在进行疯狂的竞选，殴斗和追捕司空见惯。希特勒终于获得了绝对多数。但是在这里，在凯撒霍夫的餐厅里，他却是那样地悠然安逸。第一小提琴手感情丰富地演奏着令人伤感的《悲伤的星期日》。有谁知道，坐在这里的新领袖向群众所讲的每一句话和所作的每一姿态，事先都要对着镜子演习一番，就象在演小羊和狼的故事一样。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和罗斯福同时上台。这一年德国有六百多万失业者，但是统计数字表明，经济正在从萧条中复苏。当其他国家的电影观众在为克里斯蒂娜女皇挥泪的时候，德国却在大量焚毁不受官方欢迎的书籍。脚蹬短统靴的冲锋队员虽然成功地从“凯撒霍夫”迈进了帝国总理府，但是他们遭到无情镇压的日子也已经为期不远了。世人与其说害怕好莱坞塑造的大猩猩，倒不如说更恐惧这个“奥地利的流浪汉”（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语）。

一九三一年以来，“凯撒霍夫”饭店从某种程度上说曾是希特勒的大本营，两年前虽然有人企图毒死他及其卫兵，但他还是没有离开这座饭店。为了掩盖这一丑闻，他甚至不同意把此案报告警方。

“这次谋杀案发生在一九三二年一月柏林的‘凯撒霍夫’饭店，希特勒及其幕僚经常住在这里。此案迄今仍未查清。”汉斯—奥托·梅斯纳写道，“一天，约午饭后一小时，共进午餐的所有人都感到不同程度的不适，有的呕吐、有的胃痉挛，有的甚至昏厥，于是立即叫来了医生。病情最严重的是副官布吕克纳，人们担心他有生命危险；最轻的却是希特勒，因为他进食适度，再加上是个吃素人。这种奇怪

病症的起因从未查清。食物中肯定有毒，只是量少不致命而已。为了免遭被毒死的危险，希特勒后来每天在玛格达·戈培尔处吃饭，直到搬进总理府为止。”但希特勒在“凯撒霍夫”经历的暗算还不止这一次。

一九三一年柏林交通工人罢工，褐衫党和共产党一起并肩反对社会民主党，这使希特勒失去了很多同情者。虽然他的政敌未能联合起来反对他，但是金融寡头和重工业界却减少了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①（NSDAP）的资助。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国会选举结束后，希特勒脸色苍白地冲进他的位于总理广场旁的宣传部主任家里，企图自杀。在前一天的选举中，纳粹党所得的票数从百分之三十七点四降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一，失去了二百万张选票，也就等于在国会中失去了三十四席；而共产党人却多得了十一个席位，从而在国会中占有一百个席位，比褐衫党少九十六席。

但是，恰恰是这一惨败挽救了这个布劳瑙人。“此次危机似乎可怕，”希特勒传记作家赫尔穆特·海贝尔写道，

“但时隔不久，人们发觉还不如拥护这些虽然大叫大嚷、缺乏教养、令人毛骨悚然、但至少愿意谈判和终究可以训教的纳粹。”

莱因兰和鲁尔地区的施主们又开始慷慨解囊了，民主党选择了“较小的祸害”。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终于成了“民族振兴内阁”的总理，但是内阁中民族党有八位部长，褐衫党只有两位。希特勒的对手及其扶植者胜利了。

^① 前译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译注

他们以多数票战胜了，或者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限制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到岸上的东西”（威廉·夏伊勒语）。国内局势平静。在德国占绝对优势的国防军，宣誓效忠国家总统兴登堡。虽然希特勒逼迫其对手在三月五日重新选举，但是不管表决结果如何，对手们在内阁中都必将保持绝对多数，这是不容置疑的。

政权与其说是取得的，倒不如说是骗取的。

在三月选举中，希特勒首次动用了国家的统治手段，因此必定会暂时赢得选票。但是副总理弗兰茨·冯·巴本私下自鸣得意地夸口说：“几周之内要把他挤到墙边去，直到他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为止。”但是他不知道，北德纳粹领袖阿达尔贝特·福尔克早在一九二四年就扬言：“我们的纲领，归根结底是：阿道夫·希特勒。”

共产党人已有所预感，他们散发秘密传单，号召举行人民武装暴动。不久就发生了谋杀这个心狠手辣的鼓动家的案件。但是这个暴戾恣睢的党魁似乎希望有人去谋杀他。他声称，他将受益于这场风暴。希特勒从他执政的第一个小时起就始终受到谋杀事件的威胁。第一批尝试者们准备也让他享享他为全世界设想的命运。如果他不深居简出，而是到处抛头露面的话，那么他总有一天会被自己的食言葬送仕途，也要被刺客的手榴弹或机关枪结束生命。

谋杀的威胁带来了谋杀的行动。这个褐色的总理在竞选中经常站在显眼的位置上，声嘶力竭、手舞足蹈地发表演说。他也是第一个动用飞机作为竞选工具的政客。他在德国全境东奔西窜，风雨无阻，十六天内去了五十个城市，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有三、四个集会。在他出没的地方，成千上万

的群众你拥我挤，人声鼎沸。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无法控制的人数，其中大部分是他的追随者，当然也有他的敌人。全国当时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反对这个“鼓动家”。

在戈培尔为“民族觉醒日”导演的竞选决战的前一周，这种精心组织的狂热达到了沸点。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一个爆炸性的突发事件又给火上加了油。

国会失火。

这场大火正巧发生在对希特勒最为有利的时刻，因此，连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也长期错误地认为，国会是由纳粹自己点燃的，目的在于制造迫害共产党人的契机。当天夜里，希特勒出现在火灾现场，声称这是赤色分子的阴谋，并歇斯底里般地威胁要立即绞死国会中的全部共产党议员。

希特勒的追随者赫尔曼·戈林（普鲁士的第一任纳粹内政部长）尤为残暴。他成立了一支由五万名冲锋队员组成的辅助警察部队（他们唯一的身份证明是一条白色的袖章），拘留了四千名共产党员和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律师、记者和科学家。这些人都被他们关进了集中营，其中有的在数月和数年后获释，有的却再也不见回返。

在这场蓄意策划的恐怖中，希特勒诱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条例。事实上这项法令帮助希特勒摆脱了法治国家的约束。戈培尔趁机立即提出“为冲锋队让道！”的口号。

柏林的大区党部书记导演了一场竞选决战。纳粹党调动一切力量来进行这场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竞选宣传，他们动用全国电台实况转播，在街道上装饰彩带花环和卐字旗。冲锋队员列队而过的皮靴声不绝于耳，“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一个领袖”的呼声震耳欲聋……

在此期间，有一个名叫卡尔·卢特尔的造船木匠和几个德国共产党员一起，计划在选举前夜炸死希特勒。卢特尔同他的朋友们至少开过两次会，商定了这一谋杀计划的各个细节。也许由于行动不谨慎，他们的计划被一个警察探子发现。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共产党员被捕后只受到警方而不是盖世太保的审讯。应对他们提出起诉的最高检察院反而成了他们的保护者。证人不说话，家宅搜查毫无结果，虽然这种搜查扩大到亲戚朋友，但是既没有发现武器，也没有发现炸药（密谋分子可能直到最后时刻才愿意接受使用手枪或炸弹），此外也未查获任何书面材料。一九三三年底，卡尔·卢特尔等人终于因证据不足而获释出狱。

卡尔·卢特尔等人被捕的第二天，即三月五日，是选举日。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竞选并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成绩，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反对希特勒。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点九，也就是一千七百万魏玛共和国的选民投票拥护希特勒。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七百多万张选票，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希特勒之所以还未取缔该党，目的是不让工人的选票被社会民主党得去）获得四百多万票。纳粹党及其同伙民族党只获得百分之五十一一点九的微弱多数。

尽管如此，戈培尔娓娓动听地唱道：“我们是普鲁士和全国的主人！”他在腓特烈大王的灵柩旁导演了一出波茨坦闹剧。总理在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的台阶上同“年高望重的帝国总统”握手，从而演出了一场右派联盟的丑剧。

通常穿便服的八十六高龄的兴登堡穿着陆军统帅服，而那个在仪式之前还被贬称为“波希米亚的二等兵”的纳粹

党魁却脱下了褐衫，换上了黑色的燕尾服，看上去好象是从服装出租店租来似的。

在国会开幕的那一天，兴登堡迈着僵直、迟钝的步履走进会场，举起放在威廉二世皇帝的空椅前的元帅节杖。后面坐着身穿礼服的王太子，周围是身穿旧军服的帝国时代的老元帅。这个多年来受驱逐出境威胁、后来通过关系才取得德国籍的奥地利人，堂而皇之地，在迄今为止一直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的掌声中，踏着普鲁士军人的步伐走进门来……

此后，新领袖的照片进入了德国家庭。冲锋队迅速扩大，一百万随大流的人们纷纷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三月热潮”的冲击下，它不得不暂时冻结接纳新党员的工作。

共产党第一个被取缔，一些机警的保守党人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政变才能摆脱这个“镜框中的人”。在贵族俱乐部和沙龙中，人们在窃窃私议；在地下，那些不能再失去任何东西的失败者们正在等待杀死这个暴君的时机。贝波·勒默尔是一个冒险家式的人物，自由团军官出身，起先加入了纳粹党，后来又投奔共产党，如今他正在总理府附近探索谋杀的可能性。此人思维周密，处事谨慎。他成年累月地窥测时机，对保护希特勒的措施中的漏洞都一一作了记录。

以赫尔穆特·米利乌斯博士为首的反对派组织也在蓄谋行刺，可惜在动手之前就被破获，有关他们以后的命运，档案中未有记录。

早期的敌对分子开始形成反纳粹的抵抗组织。他们渐渐认识到，只能以暴力来推翻暴君。

第一批刺客，无论是个人还是小组，都独立行动，和其

他方面还无联系。另外，还有一些狂人、酒鬼和精神病患者扬言要杀死希特勒。一星期之内，谋杀的威胁频频袭击总理府。

企图谋杀希特勒的人都知道，接近他比想象的还要容易。显然，与个人安全相比，希特勒更关心的是如何夺取全部权力。而今，保护措施却成了第一位重要的东西了。

大部分谋杀阴谋都是很容易查清的。

很多曾经准备以暴力来对付希特勒的人，如今已被关入了集中营，肯定还会有大批人步他们的后尘，因为希特勒在波茨坦感伤剧的第二天就彻底取消了魏玛时期的民主。他在克罗尔剧院召集国会会议，八十一名共产党议员“缺席”。对他们现在何处的的问题，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嘲笑说，他们“在其他地方被更紧迫和更有益的工作耽搁了”。

冲锋队在外面鼓噪：“我们要法律，否则就会发生谋杀和死亡事件！”这时，希特勒在会堂上俨然以国家元首自居，他要求议员们根据他的“不流血的革命”的指示，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企图以此取消公民的自由权和正当的法律手段。该法有效期为“四年”。

“政府将只有在为执行极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范围范围内使用这种权力。”希特勒在其首次国会讲话中保证，“这并不威胁到国会和参议院的存在……”

对这一授权法，一致投反对票的只有失望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已经没有表决的可能了，其他政党企图通过附和来推迟他们的厄运。

当天，希特勒就放弃了他曾许诺的温和政策。他首先赦

免和立即释放了五个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冲锋队员，一年前，他们在上西里西亚的波滕帕，当着受害者母亲的面踢死了一名政敌。与此同时，对社会民主党人也开始了大逮捕。工会干部、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徒遭到了所谓的“保护性拘留”，他们本来可以通过联合或组织抗议纳粹上台的总罢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

在“不流血的革命”的开头几个月中，被杀害的“国家公敌”达五、六百人，另有约五万反纳粹分子被投进了集中营。这之前，集中营囚徒就有几百万。第一次浩劫的幸存者纷纷转入地下，他们和已在地下活动的志同道合者们正在积极准备伺机东山再起。

在这种情况下，新总理希特勒开始要求警察对他进行国家级保护。而十四年来，正是这些警察经常用橡皮警棍镇压褐衫党徒的暴乱，故而希特勒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攻击。总理府办公厅主任接管了其前任的安全保卫机构。宪法规定，警察由各邦自行管辖。如果总理在慕尼黑逗留，那么巴伐利亚的警察必须负责他的安全保护；在德累斯顿，由萨克森邦警察负责；在柏林，则由普鲁士刑事警察负责。魏玛共和国早在它成立的头三年中，即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总共发生了三百七十六起政治谋杀案，但是各届政府首脑的安全保护仍然不受重视。

警察局根据总理府的要求开始派员警戒政府大楼和设立巡逻岗哨，平常只派少数人，有国务活动时相应多一些。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后，柏林警察局成立了一支由刑事警察组成的专门保卫政府首脑的队伍，该队受总理直接领导。另外还派了一名专门保护总理的警察，总理外出时，

他就坐在总理的汽车司机身旁。在遇到袭击的情况下，他有命令停车或以最快速度驶过危险点的权力。

现在，邦政府已被撤销，国家的全部权力已集中到中央，所以元首的信徒们必须尽快建立一支由专家和忠诚的门徒组成的卫队。希特勒表示，在他周围工作的警官和士兵必须由他亲自挑选，就象他在一九三一年从大量被推荐者中选出了八名陪同一样的，该卫队成员不能担任其他任何工作，必须听从他的指挥。

早在奋斗时期，希特勒就成立了一支“阿道夫·希特勒冲击队”（Stosstrupp Adolf Hitler），由一个屠夫、一个钟表匠和一个马夫组成，头头是一个侏儒般的文具商。这个冲击队便是党卫队（SS）的前身，起先是一种党内警察，属于冲锋队（SA）。党卫队成立后队员穿黑色制服区别于冲锋队。由于党卫队应是一支精干的队伍，因此有一个名额限制：党卫队的人数不得超过冲锋队的百分之十。

这些以骷髅作为标记的人受一个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人领导。他曾是普鲁士候补军官，以养鸡为生，后来自称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在纳粹上台后的第一次职务分配时，他显然受到了冷遇，但是，他仍然在慕尼黑活动，急切地等待着柏林的召唤。与此同时，柏林成立了由粗鲁的纳粹党徒泽普·迪特里希指挥的第一支党卫队武装部队，驻扎在利希特弗尔德士官学校。这就是后来的“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团”。希特勒最初从这支队伍中选了十七人作为直接随从。他们必须昼夜不停地保护他，根据情况有时紧有时松。

党卫队外勤警卫队的队员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队员和下级军官的身高规定为一米七八，军官一米八〇。他们

被反复灌输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严格训练持枪和正步走的姿势。他们必须具备一种优越感，必须是一八〇〇年以前的“亚利安人后代”，军官的亚利安血统必须追溯到一七五〇年。希特勒对他们特别友好，并赠送他们一条格言：“我们的荣誉是忠诚”。他的侍从人员也是从这些人中间选择的。希特勒的奴仆无一例外都有党卫队军衔，射击技术必须高于一般水平。在发生谋杀事件的情况下，他们必须扑到元首面前，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他。有一人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但也时常被他支走传递消息。

元首在安全方面的错误做法谁也不能责备。最初，一切保护措施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临时仓促作出的。总之，希特勒对自己的安全也持矛盾态度，可以这样说，他在这方面也是一个赌徒。一方面，他经常绘声绘色地向周围人详细回忆对他的谋杀事件；另一方面又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良药可以对付为了自己的计划而不惜拿自己的生命作儿戏的、具有理想主义思想的谋杀犯”。历史上的谋杀案，成功率达百分之九十，但是希特勒既不减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冒险活动，也不克制已经难以抑制的旅游兴致。即使在当了总理后，他还是几乎每个周末都乘车或飞机从柏林到慕尼黑，大都去他的设在上萨尔茨山上的避暑山庄。†

如果他的专用车厢挂在普通列车上，那么就会有几百名铁路官员知道此事。如果乘飞机，那么“元首座机”何时起飞，何时到达和何地降落也不保密。希特勒的随从虽然不得透露元首的活动，但是刺客总可以从《民族观察家报》^①上

① 前译《人民观察家报》。——译注

发现他的行踪。比如说，总理府外如有警卫站岗，这表明希特勒在总理府，警卫撤走，说明他已离开。

其间，希姆莱已经征服了各邦的警察。这个坐镇慕尼黑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有着不可低估的政治野心。虽则如此，还是没人预料到，希姆莱不久会战胜冲锋队，凌驾于党和武装部队之上，并企图夺取国家的全部权力。后来成立了一支元首卫队，队长是粗暴好斗的警察上尉汉斯·拉滕胡贝尔，该卫队后改称德国中央保安局（RSD），负责第三帝国全部权贵的安全事务。

这支新卫队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起先，没有计较队员的政治可靠性，因此队员中有些人不是党员，也不是党的某个组织的成员。中央保安局的成员主要穿便服，其任务是要防止暗杀希特勒的事件，主动地侦察这类事件和把这类事件消灭在萌芽阶段。

但是，他们的保护对象最初无论在柏林或在慕尼黑都不愿意看到希姆莱的这支杂牌御林军。他固执地、不耐烦地故意摆脱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便衣保镖，希姆莱对他的关怀也被认为是一种骄横的表现。但是希特勒最后还是接受了这支队伍，不过仍然坚持每一个队员都要经他亲自挑选。

上述两个并列存在的组织是天生的争夺对手，它们之间相互妒嫉，也发生了一些争权夺利的磨擦。当然，祸根还是希特勒本人，因为他的命令往往自相矛盾，再则他极其讨厌在公众场合躲在随行的彪形大汉身后。

作为一个自我表演者，这个“可爱的领袖”必须在群众当中尽量显得没有警卫。他把对领袖的个人迷信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尽力表现自己是群众的崇拜偶像。